



顾教授完全是出于礼貌才将翻阅照片的速度放慢。其中的一张让他彻底停下来。他看着照片上穿西装、打领带、梳着中分发型的年轻男子，有点愣，仿佛不经意扭了一下头，看见了远处的镜子。他看看照片再看看塞缪尔教授，然后翻转到照片背面看，背面除了茶水般的岁月陈迹，别无其他。顾教授指指照片又犹疑地指指自己，塞缪尔教授伸长脖子看照片，然后盯着顾教授看，接着指指顾教授又犹疑地指指照片。他在顾教授的手里仿佛也看见了那面镜子。顾教授除了汉语只会说俄语，塞缪尔教授除了希伯来语外还能说4种外语，但这4种里既不包括汉语也不包括俄语；他们只能像两个哑巴似的啊啊啊地相互指点。正好你从场外进来，临时充当了翻译。此次会议，你不仅要在会上宣读关于“中国小城镇化”的研究论文，还和同门的师兄兼做会务。导师的表情流露出少见的激动。导师说：“平阳，快帮我把意思表达一下。”

你看着那张照片，又看看导师，眉眼间似曾相识。你用英语

渔场一夜甚是惬意：天气晴好，月亮升空，全然没有酷寒之象。餐后夫妇二人走到野艾丛生的营地空场，身后一两丈远是三个卫士。他们相搀而行，小棉玉贴紧夫君，呼吸喷上他的脸颊。因为营中头领招待了烈酒，二人尽管浅尝辄止，还是有些燥热。小棉玉望一眼月亮，说：“我的公子，我的夫君，一匹拴不住的马儿。”舒莞屏说：“你是我认定的纯良之人，没人比你更温顺，也没人比你更仁善。我夜里难眠，总在想一件事。”“何事？”“我在想，既是兄弟，为何不能一起出逃？”小棉玉急速抽手：“不可！公子，我是不会离开的！”“为何？”小棉玉低头：“我已扎根在沙堡岛上的一棵树，摆脱了会死。”

夜晚他们宿在一间稍为洁整的窑子里。这里火炕温热，还有一座土炉。小棉玉依伏在他的身旁，半夜仍无睡意。舒莞屏对着她的耳廓说：“小棉玉，我无时无刻不在谋划那件大事。这里的春天来得太慢了，等连翘花谢了，我就上路。”“公子，求你今夜不再说它，可好？你知道我多盼一起出行！我觉得这里比婚房更好，不是吗？”舒莞屏的手抚着她的额头、眼睛，说：“所言甚是！我们逃出了那间囚牢，也就舒畅许多！”

小棉玉抓住他的手，将手指含入口中。她放开这手，又伏在他的胸前，叫着：“好壮实的公子啊！好吓人的公子啊！”舒莞屏侧身，碰到了蓬蓬双乳，就像受到电击，猛地缩回。温湿的夜色中，他任其揪扯，只是不应，最后说：“不可逾越姐弟之礼。”“这可如何是好？”她在抽泣。他咬住牙关说：“让这一夜快快过去吧！”

车队驶入捕蜚场。这里比渔

说：“塞缪尔教授您好。顾教授想问，这张片是从哪里来的。”

塞缪尔教授用英语答：“我父亲40年代在上海拍的。”

你接着翻译导师的下一个问题：“上海哪里？”

“提篮桥。”

“提篮桥！他是——我父亲！”顾教授一把抓住以色列客人的手，重复道，“他应该就是我父亲！”

提篮桥。当天晚上你就从上海地图上查到了这个地方，在虹口区。

“二战”期间，大部分逃亡到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都住这里。虹口地处公共租界和华界交叉地带，房租和物价比较便宜，所以大批流落上海的犹太难民扎堆到这里。一间屋挤了三五十号人是常事，最拥挤的房间里能住一两百人。刚到上海的爱德华·塞缪尔夫妇，那时候还没有结婚，别人称他们爱德华·塞缪尔先生和艾格尼丝·弗兰克尔小姐，在一间摆了40张高低铺的房子里住了两个晚上。两人之间隔了18张床，临睡前必须越过几十双臭鞋子相互道一声晚安。两天之后，爱德华通过一个从德国北方城市基尔来的朋友帮助，在提篮桥旁边的一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小屋子。

“我父母只告诉我，他们是他们在提篮桥的邻居，”塞缪尔教授为不知道照片上那位先生的名字深感惭愧，“家父一再叮嘱我，如果来中国，一定要打听到这位先生的名字，当面致谢。如果真是您的父亲——令尊曾在1939年10月底，开车送了他们去一家医院。”

60多年前的一个黄昏，犹太姑娘艾格尼丝做晚饭，菜刀从案板滑落，掉在脚上，割破了血管，血瞬间灌满了拖鞋。护士出身的艾格尼丝撕了一件衣服简单地做了包扎，男友爱德华背上她就往外跑。弄堂口一辆黄包车都没有。一个中国小伙子刚好停下车，他

打开车门，招呼让两个外国人上车。他把他们送到医院，等他们包扎好，再开车把他们送回来。一路匆忙，爱德华都没来得及问对方的尊姓大名，但知道他也住这个弄堂里。有一天他站在路边，用他的莱卡相机拍过这个和他一样年轻的中国人，后者对他笑笑，并没有介意他的偷拍。爱德华和艾格尼丝一直打算，再见到那个中国小伙子，一定要认真地感谢。偏不巧，接下来的一个月都没遇到。到了12月底，艾格尼丝在法租界迈尔西路（今茂名南路）上的罗生特诊所找到一份新工作，在诊所边就近租了房子，离开了那个弄堂。此后的9年里，他们常回提篮桥一带的咖啡馆与朋友聚会，从著名的麦斯考特屋顶花园出来，他们总会拐到住过的弄堂转一圈，依然没能遇到送他们去医院的好心人。

“听我外祖母说，我父亲20多岁就开车，”顾教授眼睛看着照片上的父亲，“他在哈同洋行做房地产生意。”

“老人家现在呢？”塞缪尔教授问。

“40年前就去世了，”顾教授笑笑，捂了一下两只眼睛，“当时我只有12岁。你知道，1966年，中国的‘文化大革命’开始，我父母都曾在国外人的公司里做过事，被当作劣迹拿出来批斗。大冬天只准穿一身单衣，被绑在学校操场的单杠上，一根立柱上捆着我父亲，一根立柱上捆着我母亲。革命群众斗完了回家吃饭，把他们给忘了。半夜下起大雪，连着又下了一天，等堆雪人的孩子发现他们时，我父母已经被冻成了冰棍。”

“非常对不起，”塞缪尔教授说，“非常对不起。这实在是个让人悲痛的消息。”

“没关系，多少年过去了。要感谢您，塞缪尔教授，如果看不到

这张照片，我差不多已经忘了父亲长什么样了。我父母的照片保留下来的很少，要不是因为提篮桥和那辆汽车，我都不敢断定他就是我的父亲。”

塞缪尔教授再次道歉。在他看来，中国的“文革”和纳粹屠杀犹太人差不多是一回事。此类比较并不新鲜，但当一个犹太人下此断语，你就知道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具有石头般的力量。“人类的灾难和耻辱。”你竭力寻找最准确的词语转达出以色列客人的意思，“尊敬的顾教授，我们的父辈有相同的遭遇。我父母当年就是为了躲避纳粹屠杀才来到中国的上海。当然，他们比较幸运，躲过了浩劫，去了刚建国的以色列。但是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，以及叔伯阿姨，无一幸免；有的在家中自杀，有的死于集中营。”塞缪尔教授握住顾教授的手，“家父和家母直到去世，都在想念中国，想念上海，想念每一个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。”

既缘于学术上的惺惺相惜，也因为父辈的灾难，塞缪尔教授和你的导师顾念章教授成了语言不通的好朋友。你是他们的喉舌，会议一结束就坐在他们俩中间，你把语言转化成语言，再转化回去。交流对于两位师长来说，是倾诉也是对话，还是回忆和寻找。当你殚精竭虑找到一个准确的词语完美地表达出双方的意思，两位教授一起表示感谢，一个拍你的左肩膀，一个拍你的右肩膀。塞缪尔教授说：“太棒了，小初博士！”你的导师用的是他感谢弟子的一贯方式，把赞许隐藏在貌似不搭边的格言里，他说：“语言让我们得以自我确证。”

会议满满当当开了两天。第三天，主办方邀请与会的专家学者看一看北京，塞缪尔教授婉拒了，他在中国剩下的时间极有限，他要用在去上海的寻根之旅上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# 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122）

场大上几倍，车马不断。第一批海蜇已从海中涌来，那些捕蜇人和制蜇女呼号不息。舒莞屏看到的情景与上次一样，毫无变化。那个总营头领一眼认出了他，眉开眼笑：“大人，贵人和恩人！”小棉玉小声问舒莞屏怎么回事，他说：“这位头领让我回府上说项，要求赏赐一位夫人。”

舒莞屏对总头领提出：“我要见一下女子，可好？”头领麥开两手：“啊呀大人！她来时哭哩，像小雀儿一样。我哄个不停，喂她鲈鱼肚。不到一月人就胖了，有了身孕。”舒莞屏记得这女子是洗衣房里最小的，项多十五六岁，真的瘦小如鸟。他急于见人。头领把人领来，说一声“大人寻你了”，退出。女子微胖，个子不高，肚腹有些腆。她低头捏弄手指，叫着“公子大人”。“你认得我吗？”“记得呀，”她抬起头，双眼圆亮：“谁见了公子都不会忘的。”舒莞屏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安慰道：“这里清苦，自己珍重。”女子擦眼：“谢过公子，我明白的。我生下孩儿也就有了指望。”

从捕蜇场离开已是第二天上午。车队在猎场西部炮台那儿停留片刻。这是小火童陈立将军的防地，小棉玉见舒莞屏站在那里

出神，上车问：“你还记得行营的日子？你见过这位将军的。如今是他镇守边陲了。”舒莞屏没有应声，他望着西边的苍茫，想的是出逃之路。

## 二

随着春天深入，灾情有了缓解。巡督一行从渔场捕蜇场归来，又去种植营和火器营。种植营的酒坊未能忘记这对新人，为他们奉两坛美酒。在火器营，那位头领向巡督夫妇报告一个天大的喜讯：“水下鳖船”和“凌空羽舟”初具规模，这两件天下无敌的大杀器，再经演示就可施展大能。“到那时，大人，想想看！”小棉玉点头：“府中大人正等消息呢！”“放心吧！”等连翘花谢了，我们就呈上喜书！

舒莞屏惊异于火器营的人也将连翘花作为重要的时间标记。他心里默念：“这一天啊，万万不可耽搁，我心里就像装了一团火药！”他不时望一眼巡行中的小棉玉，从她紧绷的鼻中沟上，看到了坚毅的意志和不可更易的心念：她在深夜或无眠的凌晨，都誓言助他出逃。她说：“不过，这想个万全之策，哪怕是一丝疏忽都

会招来大祸。”

他在旅程中处处留意，盘算和探究那个机会之门。他深悔第一次出逃的冒失和匆促，不再存一丝侥幸。他随身携带那份标注等高线的滨海图，琢磨所有可能的路径：猎场西部营地、浪荡岛和海胆岛。那个住在鱼骨小屋中的老人时而入梦，梦见自己与破衣烂衫的老者一起度日，饮用螺壳里的水，吃抓到的螃蟹，然后乘船离开。有一天夜里，实在忍不住，点起蜡烛摊开海图，按住大海中的那几个颗粒。她睡眼惺忪盯了一会儿，说除非你能插翅飞到那里。她认为最好的机缘，仍旧隐于巡行之路。

“好在你一直伴在身边，这会让府上大人少一些提防。”舒莞屏说。她告诉他们：“冷霖渡有个邪癖，总是对我们的事儿好奇，时而探问，说自己该不会为女儿找了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吧！”“你怎么应答？”“哦，我说睡着了都要抱住你的一条胳膊。他满意了。”舒莞屏笑了：“你倒是说了实情。”小棉玉眼圈红了：“我梦见咱俩乘一条小船，驶到大海中央时你突然跳船，怎么唤都不回头。我哭啊哭啊。”舒莞屏想安慰她，却不知该说什么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（连载76）

○陈彦

温如风及时关了所有设备，正在掐他爹的人中和虎口穴。

花如屏在拼命摇着他爹的身子，喊着都成哭腔了。

他一个箭步跑上前，一下抱住了他爹：“爹、爹，你咋了？爹——！”就在这时，他爹喉咙里呼噜了几声，似乎是醒过来了。

温如风是何等精明的人，一下大概就明白了原委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安存镰，亏你做得出！多孝顺的儿子啊！日弄你爹在我这儿整整坐了十个钟头。坐晕了，差点出人命了！孝顺！天下第一大孝子啊！安叔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看你都咋给你娘和世人交代！”

安北斗灰溜溜地把他爹背回去了。

## 38 猫头鹰说

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？

我不得不声泪俱下地要控诉一番：我的家园被毁于一旦了。

小说本来轮不到我说话，可作者总是喜欢弄个动物出来替他跑腿磨牙。《喜剧》就犯的这毛病。不过那只屁股很大、长相颇为滑稽的柯基犬，永远只操心桌子底下谁勾脚苟且以及骨头那点小事，而我思考的是大问题。当然我们品种不同，也不能怪柯基犬没有雄心壮志，造化弄人，使命使然哪！我关心的是生死问题。人都说：夜猫子进村，注定要死人。那个夜猫子指的就是我们猫头鹰。关于生死问题，人类有个叫哈姆雷特的都问几百年了，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。只有我们掌握着有关生死的秘密。《喜剧》里的柯基犬无非猎猎狂吠、钻角摸缝、搬弄一些是非而已。而我们始终谨言慎行、大音希声。所谓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；一鸣惊人，大致说说的就是我们。不过我们不是一鸣惊人，而是一鸣要死人的。

我们的寿命一般在二三十年。我能活二十九岁零三个月又七天。人类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寿数，这就是我们高过他们的地方。我们的历史主要通过口述，十分简洁，没脑子的闭嘴了事。不像人类谁都要讲话，有的废话连篇，有的满嘴喷粪，还要伐倒许多树木，制成纸张到处印发。人类从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到今天，自以为掌握了星空的秘密，其实哪有我们知道得详细，我们才是夜的精灵。尽管我也不爱太过明亮的星月，晃眼得很，但并不影响我精确掌握黑夜的秘密。

先说我们在星空的位置，距离地球两千六百多光年的地方，就有一个猫头鹰星云。你看看那脸，再看看那眼，像不像我们。不是酷似也是神似。有趣的是，那个星云刚好就在北斗七星的勺底位置。因此，我们世代代住在这个地方跟人类一样，是有说法的。

现在我不得不代表动物界要对七星山“点亮工程”骂一阵大街了。

虽然我信奉的原则是：不庄严、不高冷、不静穆、不优雅、不卖萌，毋宁死！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骂一声：他奶奶的！

“点亮工程”对于我们猫头鹰来说是一场灾难。

都知道我们白天昏昏欲睡，多数时候如醉酒状态，努力想威严地坐卧于大树之颠，却因眼前白茫茫一片，而不时会踉踉跄跄、跌跌扑扑地显出一些“醉鬼”的丑态来。这让那些白天能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的家伙，不免传为笑谈。当然它们也只敢背后嘀咕，一旦到夜间恢复了视力，我就会立即将那些白天乘我之危的“嚼舌者”，予以逮捕。我在人类的破秤上也就几公斤，而面对猎物，从高空俯冲而下的肌肉收缩力量聚集到披坚执锐的利爪时，所产生的力量可达三四百公斤以上。扑倒一个人也不在话下。不过人类报复心很重，我们还是忌惮着他们的心眼、格局和猎枪。除了人，七星山上最大的动物就是野猪、麋鹿、猕猴之类。这些家伙我们也干过，不过是在夜间它们就寝时。有时用力过猛，或将猎物捣出脑浆，甚或扑空，让自己头脸抢地，伤及皮肉，几天都只能就近抓捕些诸如蛹卵、毛虫之类的蠢货。

经验告诉我们：海神费力过大，且有一定危险性的事少干。尤其是猴子，太爱乱抓乱叫，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泼妇式的一触即跳与浅薄。因而，我们还是以抓捕山鸡、田鼠、夜莺、飞虫类小动物为要。尤其是夜莺，我基本是见一个捕一个，倒不是它有多么美味，而是讨厌那种在夜晚展示歌喉的卖弄风骚。以为它唱得有多么悠扬婉转、高亢嘹亮，有时就把我已准备好餐盘正欲享用的美食给惊得四散逃窜了。当然，也正是它好逞能表现，因而，我的听力几乎没有错误判断过它的方位，而使它们在我的领地日渐稀少。

（未完待续）